

新民学会的组建及其对早期党建的影响

赵兴华¹

【摘要】新民学会最初是一个学术性质的团体，为了追求革新学术，其会员积极投入 1918 至 1921 年的历史活动之中。经历政治洗礼后，部分新民学会会员思想发生转变，思想分歧导致学会失去凝聚力而解散。新民学会的历史活动及学会成员，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关键词】新民学会 建党思想 早期党建

【中图分类号】D4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22）04—0144—08

新民学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团体，虽然存续时间不长（1918 年 4 月—1921 年 7 月），但对中国近现代革命影响深远。以往对新民学会相关问题的研究，学界的关注点多在湖南籍革命者与新民学会之间的关系，个别新民学会成员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相关社会活动方面。笔者拟从整体出发，分析新民学会的组织创建及历史活动、学会组织解散的原因，以及新民学会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一、新民学会的组建及主要历史活动

新民学会成立初期是一个以学术交流为主旨的团体，后成为旨在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政治性团体。相比同一时期其他社会团体，新民学会纪律严格，会员执行能力强，从而保障了组织自身稳步扩大的同时，组织活动也能够顺利开展。

新民学会的最初宗旨是创造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根据新民学会相关资料记载：“这时候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乃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1] (P2)}新民学会成立时间根据萧三日记记载为 1918 年 4 月 14 日^{[1] (P166)}。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湖南学子对新学术、新生活产生了极大的热情，试图通过组织团体追求学术和生活方面的进步。在此影响下，新民学会成立，并设立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1] (P3)}

为了维护学会宗旨，良好的道德素质是新民学会对其成员的基本诉求。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成立之初建议：“要人多力量才大，会员应该多发展。不过，会员的标准不能降低，一定要品德好、志向好、学问好，确有向上要求的青年，我们才欢迎他入会。”^{[1] (P394)}加入学会需要深刻理解并认可新民学会宗旨并提出申请参加：“凡经本会会员五人以上之介绍及过半数之承认者，得为本会会员。”^{[1] (P3)}对学会所倡导的活动，会员要积极参加。而且，会员要遵守学会的纪律，有向学会汇报其思想、工作、学习等状况的义务。

新民学会在纪律约束中注重对其宗旨的保护：“惟会员对于会的精神，间或未能了解，有牵于他种事势不能分其注意之力于本会者；有在他种团体感情甚洽因而对于本会无感情者；有缺乏团体生活的兴味者；有毫无向上之要求者；有行为不为多数会友满意者。本会对于有上述情形之人，认为虽曾列名为会友，实无互助互勉之可能。为保全会的精神起见，惟有不再认其为会

¹作者简介：赵兴华，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陕西西安 710119）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青海西宁 8100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战旅法华工与五四运动互动研究”（18BSS032）

员。”^{[1](P20)}

新民学会成立后，同时在法国和国内开展活动。新民学会成立后不久，在得知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方面的信息后，学会便派蔡和森赴北京落实。蔡和森在北京与李石曾交涉后，积极鼓动湖南学子留法勤工俭学：“弟间接闻听欲往保定预备之人，颇繁有徒；此万不可以‘人数有限’遏其动机，绝其希望，当另筹一调剂办法，尽量容收，成一大组织，然后始符初心，始无遗憾。”^{[1](P46)}萧子昇、毛泽东等新民学会成员在省内极力动员，使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毛君泽东（此人未入预校）等十二人亦自湘来京，而留法之形体遂具。”^{[2](P51)}

1919年，毛泽东返回长沙后，为响应五四运动，组织部分新民学会会员联合其他社会团体创建湖南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罢课，后创刊《湘江评论》。《湘江评论》被迫停刊后，为了追求学术环境的改善，新民学会联合其他团体组织了“驱张运动”。在湖南“驱张运动”中，新民学会不仅在长沙起到舆论引导的作用，还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成员赴京联系湖南在京人士请愿，部分赴上海发动舆论宣传，部分赴衡阳联系吴佩孚，为“驱张运动”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

1920年5月，毛泽东由北京返回上海后，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半淞园召开会议。会议的决议要求会员要做到：“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润之主张学会的本身不多做事，但以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1](P8)}在这次会议中，新民学会在入会手续方面做了一定改变：“（一）旧会友五人介绍；（二）评议部审查认可；（三）公函通告全体会员，以昭审慎。”^{[1](P9)}在会友之间的态度上，会议规定：“大概谓会友间宜有真意；宜恳切，宜互相规过；勿漠视会友之过失与苦痛而不顾；宜虚心容纳别人的劝戒；宜努力求学。”^{[1](P9)}意在加强新民学会的组织凝聚力。

但随着国内外革命形势的持续发酵，新民学会成员思想渐渐发生改变，学会渐渐向政治性团体转变。到法国不久，蔡和森：“日看法文报一节，因校中功课浅，及求知欲切，决计不上课，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以为常。”^{[1](P124)}这一学习方式使蔡和森迅速接受法国各种社会思潮：“卤奔[莽]看法文报，现门路大开，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改造计划略具规模。现搜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百种，拟编译一种传播运动的丛书。”^{[1](P128)}1921年7月5日至10日，在法国蒙达尼会议上，蔡和森直接提出：“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1](P137)}萧子昇则认为：“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1](P137)}

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回复法国会友的信函中申明了自己的观点：“我对子昇（萧子昇）和笙（李维汉）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P148)}1921年初，19名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召开会议，在讨论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改造世界时：“赞成波尔失委克主义者十二人。”^{[1](P26)}

旅法新民学会成员之间，长沙新民学会成员之间，均在改造中国和世界方式方面发生分歧。1921年3月，萧子昇回长沙，根据其回忆：“由三月至七月，我们将大部分时间花在讨论社会主义革命上，但我们谈得越多，便似乎离得越远。”^{[3](P420)}会员之间思想分歧无法在组织内得到解决。最终，1921年7月，毛泽东和何叔衡参加中共一大，新民学会停止活动。

二、新民学会的解散原因

一个组织被其成员主动解散，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五四时期大环境的变迁，导致成员思想出现重大变化。新民学会不能通过组织内部解决成员思想分歧问题，也不能有效约束成员的活动，被解散不可避免。

（一）学会成员对学会宗旨理解的分歧是新民学会解散的重要原因

美国学者斯格特认为：“从理性系统的视角看，组织是一种为了完成特定目标而设计的工具。”^{[4](P31)}新民学会成立的目的是

为其成员从事学术交流提供平台，属于理性视角下的组织。新民学会组织最初圆满完成组织赋予的任务：在新民学会的组织和宣传下，湖南学子通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赴法留学的有 356 人，仅比四川 472 人少，远高于广东、山东等其他省份。湖南仅凭新民学会一组织之活动就能取得如此成就，可见学会成员组织、动员能力之强。湖南学子为追求学术环境的改善而开展的“驱张运动”，也表现出新民学会会员卓越的组织动员能力。

新民学会后期由学术组织转变为政治性团体，内部成员思想分化。部分拥有政治诉求的成员如毛泽东、蔡和森等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思想发生变化：“若天下治乱，其转移在于一心，人之贡献于人道，其功过不在形迹之上。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虽于兄意未有当，亦聊以通其狂感耳。”^{[1] (P58)}新民学会后期宗旨变为“改造中国与世界”，部分会员愿意通过实践已成功的苏俄模式来改造中国与世界，但部分会员更愿意坚持用温和的方式并试图通过组织原则约束采用激进苏俄模式者：“如有同志活动之必要时，可新组一会，新民会员全数加入亦可。不可以学会为牺牲，一时东扯西拉，凑集一些目的不相同之人。”^{[1] (P137)}导致学会对这部分会员吸引力的丧失。

由此可以判断，新民学会组织内部会员之间对宗旨理解的分歧是其解散的重要原因。到 1921 年，新民学会会员之间对宗旨理解的分歧，使新民学会已经无法成为会员共同活动的平台，学会的解散已不可避免。

（二）组织内部失去凝聚力

首先，新民学会的组织机制无法有效约束会员，缺乏持续运转的动力。蔡和森、毛泽东等会员对学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和“驱张运动”中，他们身先士卒，筹集款项，组织请愿活动，积极发展会员，提高学会的社会影响力。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这些会员保持着对组织的忠诚。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他们的思想发生改变，于是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改造组织，却遭到学会部分成员的抵制，成员离心力增强。学会组织机制涣散，无法调和双方矛盾，又缺乏激励成员继续前进的措施，这就导致新民学会出现两种可能性后果：优秀会员在组织内归于平淡，或是脱离组织。

其次，新民学会组织活动与会员个人生活失衡。学会应该创造良好的组织内环境以吸引会员参加活动，但新民学会在此方面做得远远不够。这和组织设计者的理念相关：“这是一组严肃的青年，他们没有时间去讨论琐细的事情。”^{[3] (P17)}这一理念对普通成员来讲很难做到。1920 年新民学会年会的一次讨论中提出，“会友多感室家的苦痛，急宜设法解决。毛润之谓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现在青年有室家痛苦的极多，会友中亦大多数有此苦痛，此时不求解决，将来更无办法……推举陶斯咏、易礼容、陈章甫、任培道为筹备员；究用何种救济方法，请四人筹商后得有结果，再行商决”^{[1] (P29)}，而并没有制定出具体的办法。这就给新民学会的后续发展带来问题。学会无法利用组织拥有的资源解决这些问题，必然丧失对普通会员的吸引力。

最后，新民学会所掌握资源有限，自身发展也达到极限。虽然新民学会诸多会员后来都对中国的革命有重要影响，但在当时都是刚刚走向社会的青年。客观而言，他们有热情，有雄心，但掌握的社会资源十分有限。新民学会会员发展方面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并不突出：在新民学会 1920 年冬的会务报告中提到有五十几人^{[1] (P1)}，最多时也只有 78 人。财力、物力和其他社会资源所限，新民学会发展受到很大限制，无法满足其会员的理想和雄心，会员对学会的认同度下降。

（三）外部因素

思想分歧，组织凝聚力的丧失，使新民学会发展遭遇困境。但直接导致新民学会解散的，是中国社会大环境的变迁，具体来说，是五四时期知识群体对改造中国道路的探索完成和自身身份选择的完成。

五四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现代化转型并完成身份选择的历史时期。在“西学东渐”和“西力东渐”的双重压力下，知识分子在此时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新民学会就是此时知识分子苦苦探索而产生的一个团体：“这时候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

学已经发起了，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这也是学会发起的一个原因。”^{[1] (P2)}

新民学会的发展和历史活动与五四时期国内外环境有密切关系。国际上，一战中法国对劳工的需求使中国国内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重新兴起。而在湖南，由于政局混乱，军阀势力“互相更叠，教育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1] (P5)}。新民学会会员在京期间，和许多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李大钊、蔡元培、陶孟和胡适等进行了直接的交流，并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这为新民学会会员思想的改变提供了条件。

五四运动爆发，使部分知识分子意识到在民族危亡背景下，不谈政治成为空想：“夫学生之求学，以卫国也。国如不存，学于何有？”^{[1] (P582)} 1919年5月25日，长沙新民学会会员联合其他学术团体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各校实施罢课，不久后创刊《湘江评论》，宣传新文化，但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封。12月2日，湖南学生联合会举行的示威活动也遭到张敬尧的镇压。“驱张运动”取得胜利之后，毛泽东认为，“此次驱张，纯系军事上的色彩，转足以重民众的苦痛。自今以往，我们更应有彻底的觉悟，对于这种无价值的牺牲，绝对不干。要救湖南，事事须靠着自己，没再做无谓的周旋，向老虎嘴里去请愿”^{[5] (P68)}，故积极倡导“湖南自治运动”，后因湘军内讧失败。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使毛泽东思想受到极大触动：“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1] (P76)} 一战之后法国工运兴起，在法新民学会会员广泛参与各种运动，蔡和森、李维汉等新民学会会员联合其他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先后组织了“二二八运动”“拒款运动”和占领中法里昂大学运动，但最终失败。

在经历1919—1921年的政治洗礼后，知识分子完成对救国道路和自我身份的选择。在湖南，毛泽东、何叔衡等新民学会会员意识到改造中国非暴力不能成功，毅然走向革命道路。部分成员害怕暴力革命，回归书斋。新民学会的大部分会员完成身份选择后，纷纷加入更具有生命力的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唯物史观）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1] (P163)} 在苏俄模式的成功面前，传统新民学会所倡导的无政府主义被蔡和森、毛泽东等人抛弃成为必然。

在诸多因素相互影响下，以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为标志，新民学会成为历史，其成员完成道路选择和身份选择。但作为存在3年之久的组织，新民学会的组织及活动，给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

三、新民学会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1918年新民学会会员到达北京后，逐渐受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影响，逐步萌发建党思想，并且尝试探索创建中国共产党。新民学会会员的思想和实践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一）新民学会会员建党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作为新民学会组织者之一的蔡和森，到达法国不久，通过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研究后认为：中国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6] (P36)} 1920年8月，蔡和森在对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资料的搜集、整理基础上，建党思想趋于成熟，“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1] (P129)}，他认为以中国现在的情形来看，首先必须组织共产党，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中枢。^{[1] (P130)} “然则这种党如何准备组织呢……我以为要邀一些同志跑到资本家的工厂里去，跑到全国的职业机关议会机关去……做革命机关。这种方法，我得之布尔塞维克。”^{[1] (P130)} 蔡和森详细阐述了共产党建立的必要性和建立方法：“党的组织为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份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1] (P160)} 蔡和森在9月16日给毛泽东的信中特别强调：“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方法原理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1] (P159)} 再次强调了建党的必要性、指导理论和方式。1921年2月，蔡和森致陈独秀，系统地阐述

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并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后者回复说“来信所说的问题甚大”^{[7] (P837)}。

新民学会另一组织者毛泽东，在担任北大图书管理员期间已经“很快地倾向马克思主义了”^{[3] (P22)}。1919 年底毛泽东因“驱张运动”再次赶赴北京，在京期间，他读了许多关于俄国的书，并“热心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3] (P21)}。在给新民学会会员陶毅和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提出了留俄勤工俭学的计划：“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1] (P65)} 1920 年 6 月，毛泽东在上海见到了陈独秀，他回忆道：“我曾和陈独秀讨论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本人信仰的坚定不移，在这也许是我一生极重要的时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3] (P22)} 从上海返回长沙之后，毛泽东在回复法国会友的信中明确支持蔡和森：“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 (P148)} 在 1921 年给蔡和森的回信中，毛泽东提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1] (P162)}

新民学会会员的建党思想既是时代潮流发展的结果，也是多方面交流的结果。这种交流，一方面是成员内部交流，如毛泽东、罗章龙和蔡和森之间；另一方面是成员外部交流，如毛泽东与李达，毛泽东与陈独秀等，这些都促使新民学会会员建党思想日渐发展与成熟。而其思想的成熟与发展，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条件。

（二）建党实践——新民学会成员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

新民学会会员有了成熟的思路之后，就开始付诸实践。法国蒙达尼和中国长沙、北京的许多新民学会成员积极地参与到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中来。

1920 年 7 月初，在法国的蒙达尼会议上，蔡和森、陈赞周、李维汉、萧子璋等人在充分讨论了当时的国际局势之后，认为中国革命必须要有一个能够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的组织^{[1] (P137)}，最先提出了建党主张。该主张被新民学会多数会员拒绝后，1920 年 8 月，蔡和森改“勤工俭学励进会”为“工学世界社”。李维汉回忆道：“我同和森商定召集全体社员到蒙达尼开会……约在九、十月间，工学世界社开了三天会，住蒙达尼的新民学会会员也大都参加。经过热烈的辩论，大多数社员赞成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1] (P479)} 随后，蔡和森与李维汉商议联合在法新民学会会员、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工学世界社员筹备成立共产党。1920 年 12 月 27 日，蔡和森出席“工学世界社”大会，讨论了组建共产党的问题。^{[8] (P40)} 在 30 日的会议上讨论了组建问题，议定大纲，草拟章程并于 31 日通过。蔡和森提议“工学世界社”改为“中国少年共产党”，但遭到多数与会成员的反对而没有成功。由此，“工学世界社”虽无共产党之名，已有共产党之实。“因此，蔡和森自己所说 1920 年起成为中共党员，并且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他的入党时间也可以而且应当从 1920 年算起。”^{[9] (P149)} 在家信中，他也表明了 1920 年 12 月共产党的实际建立：“我同他是一千九百廿年产生的新人，又可叫廿世纪的小孩子。”^{[10] (P64)} 在坚定信仰后，蔡和森以“工学世界社”为基础在法国开展活动，为后来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共旅欧支部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1 年 9 月，蔡和森、赵世炎领导占领中法里昂大学的运动失败，被遣返回国。1922 年 6 月，李维汉、赵世炎和周恩来正式宣告旅欧少年共产党成立，“工学世界社”成员全体加入。

1920 年 7 月 31 日毛泽东创立文化书社，特别强调对苏俄的研究，并在 8 月 22 日创立俄罗斯研究会，组织湖南学子 16 人（全国 37 人）留学苏俄，成员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等。11 月，毛泽东应陈独秀函约与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 7 人创建长沙共产主义组织。11 月中旬，毛泽东写信给张文亮，要求其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随信附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十份，并特别强调：“青年团此时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11] (P518)} 1921 年 1 月毛泽东回信蔡和森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1] (P163)}，表示正在进行建党活动。1921 年 7 月，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 10 名党员参加一大，其中新民学会成员有 8 位。

1920 年 5 月，维经斯基来华并与李大钊见面。在李大钊的引荐下，罗章龙、张国焘等与维经斯基举行了多次座谈会，后来罗章龙回忆道：“在他离京前，我们召开了一次会，会议地点在北大图书馆办公室。这个会可说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大

会。”^{[12] (P77)}根据他的回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应该在1920年5月已成立,罗章龙参与了北京方面的建党活动并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而根据张国焘的回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时间,应该是在1920年9月,应该是在1920年见过陈独秀回北京之后:“1920年8月底,我回到北京,即以兴奋的心情将和陈独秀先生谈话的经过告诉李大钊先生。李先生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他指出目前的问题主要在于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11] (P334)}1921年7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一大上的报告指出:“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才产生的。”^{[11] (P227)}由此可见,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应该是在1920年9月成立。

(三) 出身于新民学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对党的早期建设的影响

曾为新民学会会员的蔡和森、毛泽东等人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党的早期建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党的早期思想建设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蔡和森从革命实践角度出发,强调思想建设对党的重要性,他表示,应该“和各种各色的反革命派决裂,严格的淘汰一切改良主义分子、投机主义分子以及妥协分子;不仅不容许党内有右派,而且不容许党内有中派,所以才能成为整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而成就其伟大的历史使命”^{[13] (P402)},“我们知道党开始形成时,分子当然完全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同质的先进分子,纯粹的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政党能够成为同质的先进分子,非有长时期的争斗以训练不可”^{[14] (P22)}。蔡和森的建议很受陈独秀重视,他认为“从国外归来的同志能增加中共的新血液,又可纠正国内同志那种受环境影响的散漫心理”^{[15] (P613)}。在中共二大上,陈独秀、蔡和森和张国焘被推举为起草委员会成员,陈独秀为执笔人,蔡和森提出了许多补充和修正意见。^{[15] (P614)}在蔡和森参与制定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增加了对党员思想训练的条文要求。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蔡和森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央理论周报《向导》主编。蔡和森一直在党中央担任重要职务直至牺牲,蔡畅曾经评价说:“蔡和森同志在他一生的伟大革命实践中,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上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13] (P1)}

为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经验。在建党之初,毛泽东、何叔衡等党员通过成立各级支部在发展党员方面取得相当成效。中共一大召开之后,1921年10月中共湖南支部(超10人)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何叔衡等用接近群众的方法,如在工人中办夜校、读书班,在学生中办刊物或组织社团,从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并逐步扩大成为建立工会、学生会的核心。^{[5] (P123)}在中共一大召开后,原新民学会会员纷纷加入党组织之中。1922年5月,中共湖南支部改为中共湘区委员会(超30人)。根据相关资料统计:新民学会成员总78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者41人,为革命牺牲者17人。这一组织为党组织的壮大和革命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这样评价:“会员约七八十,其中有许多人,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中成了有名的人物。”^{[3] (P18)}陈独秀也曾说过:“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16] (P19)}1923年,毛泽东被调到中央工作。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首次进入中央局,任中央局秘书。出身于新民学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李维汉则回长沙接替毛泽东工作,直至1927年4月。李维汉在湖南工作期间,湖南的党组织、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都有重大发展。

在早期党领导工人运动实践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如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罗章龙负责北方工作。罗章龙亲身体验工人生活,提出“学生工人化”工作方式:“为了解决工学界限……最后结论是要求生活方面忍苦耐劳,与工人打成一片,就是说,学生生活工人化,使工人感到学生不是外人。”^{[12] (P107)}1921—1923年,北方工人在罗章龙等共产党员的组织下,对北方地区主要铁路、矿山筹建产业工会和开展罢工斗争的工作进行了规划,前后计陇海路大罢工、长辛店大罢工、开滦五矿罢工以及二七大罢工等大小斗争百余次。^{[12] (P118)}工人运动在北方兴起,罗章龙也因此成为中共工运领袖和工会负责人。中共三大以后,罗章龙调到中央工作,参与制定党的多项工运政策,兼负责编辑《中国工人》月刊。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共各级组织都遭到严重破坏,但在罗章龙努力下,1930年党与革命工人群众组织大致已恢复到1925年五卅运动之前的水准。

总之,出身于新民学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早期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革命实践中都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四、结语

新民学会最初是一个学术性团体，其宗旨是维护学会、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学会重视成员之间的学术资源分享，也注重抵制外界不良社会环境对自身的影响。在此过程中，新民学会逐步由一个学术性团体转变为一个政治性团体。随着新民学会各项活动的开展，其内部的各种不足不断显现出来，核心成员纷纷脱离组织，解散已成为历史的必然。“新民学会由组织运动到从事改造的实践转型顺应历史演进的总趋势，并且在破除旧文化藩篱、建立新社会形态的改革尝试中取得一定成效，但却潜藏着革命行动缺位的隐患，因而最终在倾向‘温和改良’抑或是‘政治革命’的抉择分歧中走向解体。”^{[17] (P151)} 与新民学会相比，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和组织的完善性使其更具吸引力。由于肩负政治使命，许多新民学会会员在学会解散过程中纷纷投入中国共产党建党模式的探索之中。正是基于之前新民学会会员各种活动经验和政治实践，使得他们更易于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过程之中发挥聪明才智，积极参与建党实践，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投入新的革命活动之中。

参考文献：

- [1] 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 新民学会资料[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2]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2（上）[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
- [3] 刘统. 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M]. 北京：三联书店，2011.
- [4] (美)W. 理查德·斯格特. 组织理论[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6] 回忆蔡和森[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7] 陈独秀. 独秀文存[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 [8] 贺培真. 留法勤工俭学日记[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 [9] 宋银桂，李泽民. 蔡和森入党入团时间考辨[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6).
- [10] 戴绪恭，姚维斗. 向警予文集[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 [11]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共产主义小组[M]. 北京：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 [12] 罗章龙. 椿园载记[M]. 北京：三联书店，1984.
- [13] 蔡和森文集：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14]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15] “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6]陈克鑫,夏远生.湘籍开国人物传略[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17]付洪,舒高磊.从知识运动到社会改造:新民学会的实践形态转变及革命未完成性[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